

试析毛泽东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 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

熊启珍

一

40 年代末,毛泽东以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思想为基础,在审慎思考和与党内其它领导人反复磋商后,形成了和平地、稳妥地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其核心思想是: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中心的革命转变战略。1948 年秋至 1950 年初,毛泽东从多方面阐述了这一战略构想的目标、中心、指导方针、基本政策及步骤等问题。

关于目标和中心。毛泽东提出战略目标是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与大工业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一方面,工业化为社会主义提供物质基础,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由于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因此,在中国,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就必须为工业化而奋斗。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宣布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向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而斗争”。并把“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作为党的纲领正式提出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的前途,中国工业化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因而,革命胜利后,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的过程。依据这样的认识,毛泽东设想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来推进国家经济面貌的改变和社会进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集中阐述了这一战略思想,向全党郑重提出了实现两个转变,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宏伟目标。

战略中心是恢复与发展经济。1949 年,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转移问题。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在农村,在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后,“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工业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是国家工业化的主导力量,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因此,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也一贯认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没有巩固的社会主义。早在党的七大上他就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后,“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1949 年又重申了此点。城市是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国家政治经济的中心,因此,毛泽东强调,党的工作重心也必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关于指导方针。毛泽东从两方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第一,调动各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积极性,共同建设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成分构成。只有这些经济的共同发展,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建设得到迅速发展。他特别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

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期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国家对这些经济应该采取适当的调节政策,以促进各种经济的共同发展,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第二,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虽然“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将起重要作用。这些经济成分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其矛盾和斗争的情形及结果直接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前途,即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抑或向资本主义发展。因此,要支持、鼓励各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既要支持鼓励其发展,又要适当节制。毛泽东告诫:“一方面,决不可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好好掌握,使它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根据上述认识,毛泽东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这一政策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共同构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被载入立国大法——《共同纲领》之中。

关于基本政策。根据上述方针,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政策。这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土地制度改革后,采取谨慎而又积极的态度和政策,帮助农民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引导农民逐步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实行对外贸易的统制。毛泽东认为采取上述政策,既能充分调动各种经济力量的积极性,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又能保证各种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关于转变步骤。毛泽东在阐述有关前途问题时表示,在进行了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后,将来再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那时“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需要多长时间呢?大约15年或20年。这是一个分两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案。第一步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如前所述,毛泽东所说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过程。这些条件首要的是工业化,其次是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和其它方面(如政治、文化)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及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也就是实现工业化的时期,也同时就是

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时期。这是一个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渐进的长期的量变过程。第二步是当各种条件具备后,即采取取消私有制的私营企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严重步骤,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较短暂的质变过程。

显然,毛泽东设想的步骤虽然是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化,但这两步并非是绝对分先后进行的。就是说,由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到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转变并非是绝对突变式的,而是在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即开始在经济结构方面向社会主义渐进。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通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逐步引导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走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思想。他认为“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¹⁰可见,毛泽东视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为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过渡形式。先互助合作,后集体化,而不是在土地制度改革后保持现状,待工业化实现后,一举集体化。对私营工商业,毛泽东提出了利用和限制政策,《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由限制而国家资本主义而国有化,非由私人资本直接国有化。总之,先完成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后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第二个转变过程中,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即先渐变后突变,先量变后质变。这就是毛泽东设想的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步骤。

上述各点都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条件的。因此,毛泽东强调必须强化人民民主专政,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稳步地完成两个转变,¹¹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上述内容分析可知,毛泽东是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中心而构想设计这一战略的。它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条件,以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基本途径,以和平渐进为基本方式,以推进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为目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其核心和基础。因此,这一战略可归结为一句话,“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¹²这就是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战略的精髓。

二

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极富创造性的革命转变战略。

首先,它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的。当时,中国的国情突出地表现为经济落后。毛泽东对中国经济的落后早有深刻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便指出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小农

经济占优势。¹³ 1949年进一步指出：现代性工业大约只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样的情况，会长期存在。”¹⁴ 并强调这种经济落后状况“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¹⁵ 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落后状况的深切认识，毛泽东设想通过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其次，它是建立在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若干特征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多次剖析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归结起来，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复杂性、长期性、过渡性、发展的两重性及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等特征。其中，过渡性是其基本特征，这是毛泽东构想这一战略的基本依据。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经济上则是代表上述四个阶级利益的五种经济成分的并存。这种客观存在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前述的落后性又决定了这种复杂状况将会存在一个较长时期。并且，由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又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可能性，即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由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及国营经济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将向社会主义发展。关于发展的方式，毛泽东曾说有流血和不流血两种，“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¹⁶ 1949年，鉴于人民民主专政即将建立，毛泽东指出“可能和平解决。”¹⁷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自身状况规定其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是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这种过渡性决定其任务是双重的，即既要发展社会经济实现工业化，又要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并在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提出了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设想。

第三，是在初步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阐述了他关于新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观点。他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¹⁸ 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毛泽东设想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主要依靠经济的发展来求得这些矛盾的解决。

关于第一种矛盾，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可以通过国家调节，使之不“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¹⁹ 他设想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分两步来解决这个矛盾。第一步采取利用与限制政策调节这一矛盾，以调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性，使之与国营经济及其它经济一道共同发展新民主主义，为最后解决这一矛盾准备条件。“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

抗的，特别是私人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²⁰ 显然，“利用与限制”只能使这一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而不可能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因此，第二步是在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巩固的物质基础及其它条件的基础上，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的形式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转归国有，从而最后解决这一矛盾。

关于第二种矛盾，应该说是1840年以来百余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矛盾的延续，是中国极端落后的现实与民族独立所要求的民富国强之间矛盾的外在表现。新中国的建立将基本上解决中国政治落后的问题。因此，1949年，落后突出地表现为经济落后。这种经济落后与中国人民争取彻底的民族独立的要求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第二种矛盾的实质。解决这种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工业化。正是在这样的分析认识基础上，毛泽东阐述了如下观点：“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²¹ “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²²

同时，毛泽东还认为新中国内部工农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通过供给机器、组织合作社、参加国家管理等予以解决。”²³ 他说，“我们把土地给了农民，但是没有给他们商品，这是他们需要的而我们没有的。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那么我们就不能保障农民所需商品，我们就将失去对他们的领导。”²⁴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仍是依靠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来解决工农之间的矛盾。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通过对上述各种矛盾的分析，认识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成为解决诸多矛盾的关键。诚然，毛泽东并未从理论上认识经济落后与解放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这无疑限制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但毛泽东已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并紧紧抓住了它。可以说，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正确回答了在各种矛盾交叉并存的极为复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是解决新民主主义社会诸多矛盾的极富创造性的设想；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的思想，为全党树立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正由于此，在新中国建设的初期，无论情况多么复杂，阶级斗争多么激烈，开展了多少群众运动，全党都能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这也是这一时期能够迅速取得恢复国民经济这一重大成就的根

本原因。

总之，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是建立在对国情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极富创造性的革命转变战略。在理论上，它使毛泽东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更加充实、丰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更臻完善；在实践上，它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由第一步发展到第二步的科学的行动纲领，是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蓝图。

三

毛泽东这一战略也有某些疏漏。这主要表现在对工业化任务的严重性、重要意义及其地位的认识方面。首先，毛泽东虽然认识到了中国经济的落后性，但对改变它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的复兴和发展速度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他估计“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²⁵中国经济在3年5年将会恢复，10年8年会有巨大发展。²⁶一般地说，毛泽东的这种估计是有根据的，比较客观的，与建国初期的实际比较吻合。但依据这样的估计，设想在15年至20年时间里达到工业化这个目标，则显得根据不足。1949年，中国经济的整体水平还不及英国在1800年的水平，要求仅用15年至20年时间跑完英国这样的国家用了近200年时间，其间经历了2次工业革命的路程，达到它们在本世纪初的工业化水平，是不够现实的。这种不够切合实际的估计，是导致后来忽略工业化任务的严重性，更为重视社会主义化这个任务在认识上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对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局限影响到对工业化重要意义的认识。如前所述，毛泽东已接触到了落后的现状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但却并未从正面去认识这一矛盾，而只是强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指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土地改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根据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之间的逻辑联系起来看，工业化任务的提出便缺少国内的依据，它似乎仅仅是为社会主义准备巩固的物质基础。于是，工业化任务便处于从属于社会主义化这个任务的地位了。而这与毛泽东把工业化作为这一战略首要任务的本意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从而埋下了后来突出社会主义改造，在实际上降低工业化重要地位的伏笔。再次，毛泽东对两个转变即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化之间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毛泽东是用一种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观点来构思这一战略的，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未给予准确定位和深入的理论阐释。至于二者之间的衔接，虽可从字里行间窥见一些，但毛泽东从未正面直接描述过这个问题，没有提出两者连

接的明确的时间程序表。这也为后来将社会主义化提前留下了间隙。这一战略所选择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是当时苏联计划经济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模式，这对后来的实践也有不利影响。但笔者以为，在当时条件下，毛泽东和党内其它领导人都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新设想。我们不可超越历史条件去苛求前人。

这一战略构想形成于革命战争飞速发展，革命迅速胜利、百废待兴之时，出现上述某些疏漏是难免的。通观整个战略构想，毛泽东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不仅是一个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极富创造性的革命转变战略，也是一个比较完备的革命转变战略。

注释：

19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1081、1081、10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 15 18 20 21 2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428～1429、1432、1430、1433、1432、1433、1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256、1254～1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22 2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139、146、146、1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4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注8，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236、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毛泽东：《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载《人民日报》，1950-06-24。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27页，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1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讲话》，载《党的文献》，1995（4）。

16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4 转引自《米高杨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下），载《党的文献》，1996（3）。

26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4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49-12-04。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曾德国）